

从艾什诺兹和图森小说看当代主体的两面性

赵 佳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法国八十年代后的两位小说家艾什诺兹和图森作品的分析，旨在揭示当代西方社会中个体的困境。艾什诺兹和图森通过各自的文学作品，试图用虚构的方式呈现一个昭然的社会现实，即主体行动能力的萎缩。艾什诺兹笔下的焦躁的主体在行动中逃遁，行动主体无法在行动中展现自身内在性。与之相反的是图森的小说，他描绘了一个有意识却没有行动能力，在逃遁中行动的主体形象。当代主体的行为中，必然性和自由意志、外在形势和个人主体性、行动的愿望和能力之间难以获得平衡和协调，由此产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可被看做当代主体的两面性，即自闭和焦躁。法国当代小说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轮廓模糊，没有定性的主体形象，叙事中个体的艰难回归最终被怀疑和戏谑解构。
关键词：艾什诺兹 图森 当代主体问题 焦躁 自闭

作者简介：赵佳，浙江大学法语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国当代文学。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项目批号：Y201329408】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Title:The Double Face of the Contemporary Subject as Seen in the Novels of Echenoz and Toussaint

Abstract: Our study aims to highlight the difficulties that face up the contemporary subje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wo representative novelists of the French literature of the 1980s, Echenoz and Toussaint. In their fiction, these authors have put into evidence that the ability to act reduces in the subject. In Echenoz's works, the anxious subject flees the action and the impulsion replaces there as on and thus becomes the driving force to act. By contrast, in Toussaint's works, the subject withdraws into itself and refuses to act as an adult. The contemporary subject cannot balance necessity and free will, circumstances and subjectivity, and desire to act and ability to realize, which explains his double face.

Key words: Echenoz Toussaint the contemporary subject problems febricity autistic withdrawal

Author: Zhao Jia is lecturer at the Department of French Study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Email:zhaojia@hotmail.fr

20 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法国文坛逐渐显示出回归的浪潮：对叙事的回归和对主体的回归。在经历七十年代“新小说”派对所谓经典小说的小说性（情节、人物、道德等）的控诉后，八十年代以子夜出版社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小说家们表现出与前辈相异的旨趣，他

们重新审视和利用经典小说性，借以创造一种在破坏和传承间寻找游戏支点的小说。相比于七十年代的“新小说”家们，以艾什诺兹和图森为代表的八十年代“新新小说”家们表面上恢复了此前被有意识地在叙事中淡化的两个因素：一是关注现实世界和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二是将所观察到的内容，运用一定叙事技巧，组织成有情节、有结构、有人物、可被阅读的故事。如此构架的故事和人物不是对经典小说的简单回归，“确实主体和叙事（同时还有现实，历史，抱着批评的态度介入，抒情性）重返文化舞台，但是以不断提出的疑问，悬而未决的难题，迫切的必要性的形式出现。这样看更正确一些”（Viart, Vercier and Evrard 20）。如何赋予分崩离析的周遭世界以意义？如何认识在个人主义浪潮和单一化平面化倾向之间变得逐渐模糊的主体形象？如何通过不可能再重新变得清晰和有效的叙事来展现当代社会的状况？这些问题像幽灵一样干扰小说回归单纯，连贯，意义严明的虚构世界。对主体性的探讨和对小说叙事方式的探索相辅相成，对应于片断化、意义不确定的叙事，法国当代小说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轮廓模糊，没有定性的主体形象。叙事中个体的艰难回归最终被怀疑和戏谑解构，个体不再是丰满，坚实，具有个人历史和家族关联的人物形象，他变得“开放，变动，其他或虚构，或神话，或离奇的存在穿越其间，形成各自的叙事”（Bertho, “L'attente postmoderne” 738）。

我们可以从当代主体的行为特征中瞥见存在的问题，在他的行为中，必然性和自由意志，外在形势和个人主体性，行动的愿望和能力之间难以获得平衡和协调，于此产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可被看做当代主体的两面性，即自闭和焦躁。在法国当代社会学家阿兰·艾亨柏格笔下，这两种倾向成为压抑和冲动两种心理学上的基本机制：“它们是病态行为的两个方面，在压抑的情况下，行为是阙失的，在冲动中，行为不受控制”（Ehrenberg 213）。换言之，日常生活中的焦躁倾向表现在有行动的冲动但没有明确的目的，自闭则表现为过分关注内在性，从而忽视和外部世界的互动。两者虽然表现形式相异，但是在很多方面呈现出相同特征。首先，两者都揭示了当代主体性的缺陷，比如缺乏意志，思想薄弱等等。其次，两者都产生了某种分离现象：焦躁的人外在行为和内在性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离，他们是行为的执行者，而不是创导者；自闭的人则完全从外部世界抽离出来，内在性和外部世界几乎分离。最后，两者都会产生某种混淆：焦躁的人倾向于把被迫的行为当做自身的理想；而自闭的人倾向于把自闭理想化成宗教情怀。这两个心理学上定义的病态行为似乎恰如其分地揭示了当代法国社会中个体可能存在的普遍问题，文学作品以浓缩和夸张的方式将主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倾向放大成病态形象，从而将个体问题放到整个社会背景下来观照。本文旨在通过对艾什诺兹和图森小说的人物分析，探讨当代法国社会乃至西方社会中个体的困境。

一、艾什诺兹：在行动中逃遁

艾什诺兹最初的小说通常表现了在广阔复杂的时空中不断移动的人物形象。乍一看，他的小说披着传统历险小说的外衣，但是人物的地位和经典小说相比有了很大改变。主人公的行为既不以群体理想为目标，也不以个体意志为动力。他既不像史诗英雄那样将外部世界看做表达群体理想的舞台，历险过程中遇到的任何境遇都不过是英雄情怀得以展现的背景。他也不像堂吉诃德这样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拨现代性浪潮中出现的主体形象，将目光从群体理想投向个体自身的萦念，并将行动看做是实现个体理想的方式。艾什诺兹笔下的主人公与其说在创造行动，还不如说在经受历险。他经常无缘无故地掉进一个与他并不相

关的故事里，对故事中人物的利害关系也不甚了解。他在行动，但又不知道为何行动，他甚至没有任何弄清现实的欲望。他并不试图去理解发生了什么，他只听凭周遭世界把自己卷入到行动的洪流中。艾什诺兹笔下的人物是“天才的疯子，情绪紧张抑郁的人，多变的变态”，他们展现了“一个毫无确信的世界的惊悸”(Bessard-Banquy, *Le roman ludique* 233)。

《一年》的主人公是个叫维多利亚的年轻女人。一天早晨，她离开巴黎的公寓，只身出发，漫无目的地穿梭于法国各地，历时一年后回到巴黎。故事一开始寥寥几笔介绍了维多利亚离开的原因：她一早醒来，看到自己的情人已死去。于是她收拾行装，奔向车站。作者没有提到死去的情人是谁，他是怎么死的，维多利亚又是怎么想的。读者唯一知晓的是，维多利亚也不知道她情人是怎么死的，她不知道死因跟自己有没有关系。因此，情人之死从一开始就是个谜，故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释这个谜，而是借此将女主人公放到行动的轨道上，一发不可收拾。故事的前因后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行动中的人和行动本身。主人公根据外部世界形势瞬间决定自己的行为，她的行为并没有明确目的，莫名的紧迫感是行动的唯一动力。

在维多利亚整个行程中，她随机选择路线，目的只有一个：逃离。虽然表面上看，她给人的印象是为了逃避警察的追捕，但实际上她并不确信自己是否和情人的死亡有关，更不试图弄清事情的真相。这个人物兼有行动的冲动和非理性的恐惧。这两个因素汇聚在路易·菲利普这个神秘人物身上，读者唯一被告知的是他时不时出现在维多利亚面前。如果一开始，路易·菲利普只是为了安慰维多利亚，此后他的出现越来越离奇，以至于他成为维多利亚恐惧的根源。每次他无缘无故出现，维多利亚便无缘无故逃离。在这场捉迷藏的游戏里，行动既和外部世界隔离，又和人物动机无关。随机，非连贯，非理性是人物行动的特色。人不是行为的主体，他降格为某种动物本能；小说主人公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是作为内在冲动的载体。“此外，小说所有元素重现了不知满足的原型，缺失，断裂，疯狂运动的修辞”(Bessard-Banquy, *Le roman ludique* 242)。

艾什诺兹的前两部小说《子午线》和《切罗基》则以另一种方式展现了焦躁的行动主体，它们刻画了这样一种处境：主人公掉进超越个体的某种外部力量的陷阱中。在《子午线》中，众多人物被聚集在一个名为“威望”的发明计划中，为了得到这项发明，各派势力陷入互相残杀中，最后真相大白：这项计划是发明公司大老板为了除掉毫无利用价值的发明家而使用的障眼法。在《切罗基》中，同样各色人马在骗子弗雷德的操控下纷纷卷入到邪教事件中。在这两部小说中，人物被动扮演某种强大势力强加给自己的角色，他们并不试图弄清行动会导向什么，或者自己在整个计划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他们感觉到自己消极的一面，但并不因此具有拒绝现状的意志，他们选择接受既定秩序的支配。这里涉及到的不再是动物本能，而是机械反应，“就像继续遵循社会常规仪式的机器人，有点像一具本能活动和反应还在继续运行的僵尸”(Rosset 72)。《切罗基》主人公乔治在小说接近尾声时明确表现了这样一种状态：

他不想一个人待在阿尔卑斯山路边，不知在等待什么。他摇摇头，不，他重复道，想到更普遍的状况，就像是对整个处境说不。

——我们可以把你载到什么地方去。

——是这样，乔治说，把我载到什么地方去。

于是他旋即一下坐在金属板上，在一辆陌生的雪铁龙车后颠簸，被一群陌生人通过国道线载向一个未知的目的地。没人说什么，除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有一会儿朝乔治转过身来，跟他说我们将路过寺庙，在那里停一会儿。好的，乔治说。就算她说我们将路过大海，太平间或瑞士，乔治也会同样说好，他有点失神。(Echenoz, *Cherokee* 200-01)

这一段描写恰如其分地表现了精神上流离失所，不知归处，随波逐流的人物形象。焦躁的情绪和疯狂的行动共同指向行为目标的阙失，在最浅近的层面上是行动直接目的的模糊，在更加广泛的层面上，则是一代人精神终极目标的空虚。无尽的躁动最终带来精神和肉体上的筋疲力竭。乔治在运动过程中的短暂停歇片刻感受到了这种疲倦感：“乔治最终放慢脚步，在一小块被人遗忘的土地上停下脚步，野草和枯萎的灌木横生，一片荒蛮的景象。他不顾有没有刺，躺倒在草地上。他气喘吁吁，感到疲倦，他很快就会脚痛，然后是右肩。他并不试图弄明白费尔南发生了什么事，或者他究竟为什么逃跑。他觉得现在没法分心，除了不断逃离一切……” (Echenoz, *Cherokee*175) 内在空虚在外部形体上表现为疲倦和逃离一切的愿望。乔治处于一种半清晰半混沌的精神状态中，清晰的是他意识到了自身行为的无意义，因为它不能填补空虚，或者说它填补空虚的唯一方式是遗忘。混沌的是尽管有片刻清晰的意识，乔治还是不能摆脱冲动的支配，逃遁到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危险的行动中。像乔治这样处于半明半暗精神状态中的人最终在行动和静止间摇摆。两者妥协的结果是产生一种模棱两可的退避，即在行动中逃遁。主人公参与行动，甚至非常积极，但是单纯作为由某种外在必要性导致的行动的执行者。他参与到行动中，但对行为的理想和原则并不感到热情，他承受行动后果，但并不为此感到担心，他既在行动中，又在行动之外。

艾什诺兹小说中充斥着这样的角色。比如《子午线》中的盲人杀手胡塞尔被雇追捕发明家拜伦。他是个颇具声望的职业杀手，在和他雇主的一次交谈中，为了证明自己的职业能力，他想在雇主面前露一手，结果失败了。雇主对他说：你失误了。他承认道：确实经常失误。这里，失败并没有被看做是失败，它只是诸多结果中的一种。职业杀手的名声和他对自己工作漫不经心的态度顿时消解了故事的严肃性。发明家拜伦在工作中也表现出同样的漫不经心。他在小岛上本应该埋头做发明，但他一反常态，醉心于拼图游戏。

无所谓的态度像疟疾一样蔓延在艾什诺兹的小说中，和频频发生的戏剧冲突形成鲜明对比。毋宁说它揭示了主体行动能力的退化，还不如说是主体在将行动和内在性嫁接起来的过程中碰到了很大困难。在史诗和各种不同的历险小说中，行动和主体内在性之间存在两种关系。第一种关系是个体经历无数磨难，始终保持精神上的同一性，即以前是什么，现在仍然是什么。环境和历险并不能改变个体的灵魂，因为此类叙事的前提便是灵魂的完满性，行动和经历只是揭示完美灵魂的手段。第二种关系是个体在重重历险中最终获得本不具有的灵魂的完满。在这两种情况下，行动具备意义，它或者揭示出主人公原本就有的高贵品格，或者通过和外部世界的互动，塑造主体中潜在但并未长成的高贵品格。

与这两种关系相反的是，对于在行动中逃遁的人来说，主体和行动是分离的。行动通过无形的力量自动展开，人物执行行动，意志和思想并不参与其中。外部世界和主体内在并没有互动，行动既不体现也不影响主体个性，主体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改变。艾什诺兹笔下大多数人物都是如此。他们因为必要性和迫切感参与到行动中去，但从来都没有在行动中检验或增强自己灵魂的愿望。环境和形势就像偶然飘进人物生活中，不留下丝毫痕迹

地消失。

在行动中逃遁的主体接受考验的意志和甄别事实的能力减弱，这经常表现为瞬间的失忆。比如维多利亚在见证情人之死后怎么也回想不起前夜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子午线》中的杀手赛尔莫，当他不明就里地结束一次行动后，“一切在他看来都是那么遥远，受到破坏，被拉平，就像三十个小时的睡眠标志着一道界线，立下了一堵边境墙，在边境之外，他的生活不能被记忆保留，它被无所谓的态度撞击着，就像我们在一堵墙上打上公用的标记”。失忆这个症状体现了个体无法建构自身主体性。艾什诺兹描绘了“倾斜的，心理上迷失，外表具有变动性的人物肖像”，他们体现了“迷失的主体的精华，受到退隐和丧失的威胁”（Echenoz, *Le Méridien de Greenwich* 252）。可以这么说，小说家疯狂增加历险情节，又对情节有效性和整体性置之不理，在行动中逃遁的人物既参与行动，又对行动目的和结果毫不介意，叙事者和人物两者互为镜像。

在艾什诺兹的一些小说中，人物并不完全缺乏意志。在巨大而严密的组织的统治下，个体往往会产生幻觉，以为行动的动力来自于个人的理想。这个理想往往聚焦在一个特定的女性人物身上。就这样，《切罗基》的主人公乔治满怀热情地追随一个在图书馆中偶遇的年轻女人，他的行为动机几乎生发这样一种单纯的吸引力。如果一开始他仅仅只是感到被吸引，渐渐地，吸引力转变成理想。他对这个女人一无所知，但他把她视若神明，追随到底。最后读者会发现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引诱乔治进入邪教做替罪羊的诱饵，所谓的个人理想最后被证明是超越个人的组织操控的结果。通过乔治这个人物，我们能隐约窥见当代某些处于行动冲动中的个体可能有的理想可疑的一面。如果理想这个词暗含了理性、本质、普遍的特点，那么焦躁的主体怀有的更多是内在冲动升华成的悬念，最多可以称为被理想化了的悬念。理想化了的悬念并不像真正的理想那样是主体内在性的自然展现，它被外界形势激发，并一再需要外界的印证和滋养，这就是为什么理想化了的悬念需要得到迫切行动的强化。它给与行动主体以虚幻的热情，从而使他主动参与其中。反之，焦躁主体通过迫切的行动一再强化这个被体系制造的理想，并且坚信他的理想确实是他内在性的体现。由此，超越个体之上的强大体系和个体互相交织，共同维持悬念的持续运行。虚幻的个人意志实际上是体系的产物，体系针对个体内在性薄弱的一面，成功将体系的目标转换成个体的理想。所以理想化了的悬念不但没有展现个体灵魂中高贵的一面，反而一再强调其薄弱的一面。

理想化了的悬念必然展现出它人工的一面，因为它是被制造出来的，缺乏任何本质性的一个形象。与一般模仿现实的形象不同的是，这个形象不模仿任何东西，它就是现实本身，所以我们可以轻易将形象和现实等同起来，当形象成为既定现实时，我们便不再需要质问形象具体的内容和可能的意义。当乔治被带到一个房间，灌了药，行动艰难，通过窗户看到追寻已久的年轻女人时：

乔治心情激动，笨拙地直起身子，他用了用力，就像隔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需要用力。他感到自己似乎缓慢前进，占据了旁边很多空间，但他最终走到窗户边，珍妮·慧特曼确实在那里，她站在对面窗户后，跟那天一样，穿着黑色的裙子，透过昏暗，反光的长方形窗户，乔治分辨不清裙子上兰灰色的细节。她站着一动不动，以至于有一瞬间乔治疑惑这是不是她的画像，或许是一尊模特，但他们靠得足够近，乔治能看到她眼睫毛在动。他想笑，做个手势，但是不行，一道深渊将他们分开，深渊底

散落着垃圾，破旧的玩具，死去的绿色植物，内爆的电视机，自行车轮胎。

最后一刻，珍妮·慧特曼把一个手指放到嘴唇上，这可以有很多意义，然后她就消失了。乔治呆呆地对窗的空架子，就像对着一台重新变空白的电视屏幕。他转过身，巴里摩尔已经重新坐下。乔治重新回到座椅上，瘫坐在那里，大大地舒了口气，深深的满足感混合着深深的倦意。(Echenoz, *Cherokee* 87-88)

通过女演员模拟的情景，通过表演在主人公心里激起的复杂情绪，小说家巧妙地描述了形象的逻辑。一切都是被导演好的，一切都揭示了人工的特性。乔治被置于观众的地位，窗户是将舞台和观众分开的象征物。女演员创造了如此真实化的形象，以至于观众一时间分不清看到的究竟是现实还是模拟：混淆现实和形象的游戏自此开始。其次，形象是如此真实，如此贴近观众，但同时它在自己和观众之间构筑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被制造的理想是如此切近，又是那么遥不可及。最后，形象让人迷惑不解，因为它故意制造出模糊不定的内容，似乎充满意义，其实背后没有任何实质性内涵。它越是显得神秘，观众越是被吸引，同时越是感到永远不可理解形象的绝望。和现实混为一体的不可触及的形象同时让人感到激动和疲倦，这些情绪抑止了观众的思考能力，虽然形象的人工性质是那么明显，身处观众席中的人却视而不见，形象所激发的意念成为人物唯一的坚定的行动目标。

二、图森：在逃遁中行动

在西方当代社会中，个人主义的盛行造成两个极端影响：一方面个人主义给了个体前所未有的自由，风俗的开放，道德的松懈，意识形态的退隐，民主的诉求，对边缘群体的关注，文化等级的消除，一切都在昭示一个远离惩罚和监禁的消费社会；另一方面，没有了规范和禁区之后的个体却没有相应的承担个人命运的能力。社会对个人能力的衡量标准从适应社会规范到自己给自己创造法则。显然，很多人还没有准备好，或者说社会并没有给与个人以承担自己命运的能力。“新规范的结果是，我们生活的整个责任不但由每个个体承担，还有个体和个体之间形成的群体关系。这种生存方式形成了责任病，感到自己不行是这个病的征兆之一。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人会情绪低落，他们为必需成为他们自己而感到疲倦” (Ehrenberg 10-11)。

当代西方文学中不乏这种类型的人物形象。图森的小说以幽默的笔调描绘了漂浮中的人，所谓漂浮是指他们在内在性和现实行动之间找不到平衡。他笔下的人物似乎很难找到融入他所在社会的支点，或者因为人物本身没有坚实的性格，难以确定对世界的感知，或者他和外界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共鸣，以至于完全沉浸到内心世界中。主体和世界的关系可以概括成“微小但本质的不适应” (Toussaint, *Fuir* 64)，主体并不试图去融入环境，因为和世界的失调并没有造成主体强烈的内心冲突，他安然接受现状，既不改变自己，也不改变世界，在微小但本质的不适应中获得妥协。如果说艾什诺兹表现了一个陷入越来越隐晦的权力中的世界和一群随波逐流，在行动中逃遁的失败者 (*loser*)，那么图森要表现的是一个丧失总体性，逐渐分崩离析的世界和一群放弃抗争，在逃遁中行动的局外人 (*outsider*)。两者共同展现了当代西方社会主体性一个硬币的正反面。

图森的第一部小说《浴室》为图森此后的小说奠定了基调。这部小说描写了陷入细微、琐碎、庸常生活的中的人。小说开始，主人公将生活完全局限在浴缸里，他的所有活动陷于观察，思考，与女朋友简单的交谈，以及一些非常琐碎，没有意义的动作。小说进行到

一半,主人公走出浴缸,到意大利度假。旅行途中也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一切以日常生活的惯有步调缓慢前进。小说最后,主人公回到浴缸,继续他的生活。整部小说形成一个首尾呼应的循环,生活在这个循环中日复一日地逝去,中间的旅行并没有打破这个循环,它只不过是浴缸逻辑的在现。曾经有的疑问和走出去的冲动并没有在行动中得到解决,小说最后再次重复了对现有生活的质疑。但这样的质疑并不触动主人公内心深处,矛盾和困惑在图森人物惯有的幽默语调中被遗忘,就像是对生活的不屑态度避免主人公进一步探讨问题的本质所在。

在第二部小说《先生》中,似乎有了进一步发展。主人公不是毫无作为,相反的,他名校毕业,在一家大型汽车公司供职,收入丰厚,生活没有明显的问题。然而,图森想要通过这个人物说明的并不是个体缺乏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而是个体作为个体本身,无力发现和承担超越现状之外的更加广阔的人生。尽管《先生》中的主人公拥有良好的生活条件,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但本质上他和《浴室》的主人公并无二异:在日复一日的庸常生活中消耗生命,缺乏走出去的动力和勇气,时不时感到愤怒,但是愤怒很快成为生活之流的一个小波浪随风而逝。通过“先生”这个匿名的人物,图森似乎把一个个体的状态扩展到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先生是当代人的一个可能形象,迷失在幻灭的世界中。虽然对任何事物都缺乏确信,但他却被今日享乐主义的成为你自己的命令敦促,被迫确立自己的观点和兴趣”(Bessard-Banquy,“Monsieur Toussaint”112)。

和《浴室》主人公不同的是,“先生”并不从生活中退隐,他更多是在似真似假间洒脱地嘲笑生活。“生活对于先生来说是个儿戏”(Toussaint,*Monsieur*111),叙事者这样说道。他在工作中保持低调,不多使一分力来获得优异成绩,“先生”对此并不关心。在他和其他人的关系中,他尽量退让,以至于唯唯诺诺,优柔寡断,从来都不知道拒绝。与其说他想取悦别人,还不如说他想避免争端,安然继续他那波澜不惊的生活。先生既不像艾什诺兹笔下几乎没有知觉随波逐流的人物,也不是完全意识到外界和内在之间的不协调,逃遁到内心世界中的人,他处于两者之间。他既不对生活说是,也不说不。他对现状有一定意识,知道并不是理想的状态,但他对不适的体验并没有强烈到放弃生活的地步,他甚至还能从现有生活中获得些许满足。他所作的唯一努力是不争不抢,运用最小的必要的努力维持生活,悠悠然度过一生。“先生并不向生活索要更多,一把椅子而已。那儿,在两个犹豫之间,他试图逃遁到简单安详的动作中去”(Toussaint,*Monsieur*89)。

这里,我们看到主体内心矛盾和改造世界的的能力减退。事情没有任何变化,甚至连变化的愿望都不曾出现。在说到苏珊·雅各布和图森的小说时,米歇尔·拜伦说:“卢克和图森小说的叙事者属于这样一类人物,他们似乎根本没有试图去抗争,就已经提前同意消失。自此消失的是社会性存在,即争取在社会中获得一席之地,并竭尽全力保全他们的位置。甚至在游戏未开始之前,当代人就这样放弃拼搏,直接喊停”(Biron 28)。图森运用惯有的轻盈语调,在漫不经心间描绘出陷于永恒童年中,拒绝成年的当代人形象。

如果说焦躁的主体容易掉进理想化絮念的陷阱中,自闭的主体则倾向于把不抗争态度理想化成某种宗教情怀。图森小说的主人公就有这样的倾向,他们把绵软静止的人生哲学推向极至,以便为自己的消极寻找合理解释,自闭被提高到追求虚静的宗教高度。拒绝行动首先表现在拒绝时间性上。《浴室》的主人公表现出对流动中的时间的厌恶:“我坐在床上,头伏在双手里(一直保持这些极端的姿势),我自言自语道,人们并不害怕下雨,有些人从理发店出来会害怕,但没有任何人真正害怕雨下个不停,持续流动,消除一切,

一切都消失其中。我站在窗前，感到困惑，眼前展开的各种运动，雨，人和车的移动所激起的害怕说明了这种困惑。我突然害怕起坏天气来，而真正让我恐惧的，再说一次，是流动的时间” (Toussaint, *La Salle de bain* 32-33)。在图森的小说中，逃避时间性的主要方式是在对时间的遗忘中行动，确切地说，不加思索凭本能行动。下面这段描写体现了这个原则：“在玩飞镖的时候，我安静而放松，我感到很安详。空寂慢慢占据了我的心身，我深入其中，直到脑子里的最后一丝冲突消失。此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我把飞镖射向靶子” (Toussaint, *La Salle de bain* 89)。有时，安详无冲突的行为原则被悄然偷换概念，变成只被冲动支配的行为，例如以下这段描述：“午睡后，我并不立即起床。我倾向于等待，冲动迟早会来临。它可以使我无视我的身体而行动，姿态自如，不需要经过深思熟虑” (Toussaint, *La Salle de bain* 93)。

以静止代替行动，以自发行动代替经过考虑的行动，这两条原则似乎应和了古希腊思想中 *vita contemplativa* (静观中的生命) 和 *vita activa* (行动中的生命) 的区分。*vita activa* 包含了人类所有活动，和绝对静止相对。但是绝对静止并不等同于普通意义上的静止。所谓的静观指的是行动意识的丧失，但是处于静观中的人并不因此绝对丧失行动，内在意识的静止并不必然带来身体行动的丧失。在这种情况下，迫使身体行动的不是冲动，而是身心平衡状态下对外部形势的回应。另外，静止并不一定是静观。如果行动的停止是出于意志的匮乏，那么它更接近于病态而不是静观。病态和静观间的区别在于灵魂的安宁，无论在行动中还是在静止状态。这份宁静远非孱弱，相反它构成了潜在的蓄势待发的意志。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很容易将病态和作为宗教境界的静观混淆起来。这两者虽然表面看具有一定相似性，实际上根据意志力存在与否截然区分开来。因此，在缺乏行动意志的情况下对静观状态的任何模拟只会导致幻像破灭。《浴室》中的一段描述清晰表明在病态的静止中躁动的存在：“我在火车车厢里过了一夜，一个人，没有灯光。一动不动。捕捉运动的迹象，只针对运动，对外部的，明显的，任凭我的静止而载我向前的运动。但也对我正在消解中的身体内在的运动，我开始专注于这个不可察觉的运动，我想用尽一切力量将它固定住。但是怎么捕捉到它？在哪里能观察到它呢？最简单的动作就会使我分心……” (Toussaint, *La Salle de bain* 55-56) 图森笔下这类模拟的宗教情怀是“最后一批现代者的形而上学，被后现代轻率对待，成为纸上谈兵的形而上学” (Bertho, “Jean-Philippe Toussaint et la métaphysique” 24)。如此这般，图森似乎想指出垂垂老矣的形而上学理想不可能在当代语境下，通过自我封闭的主体来实现。作者的嘲讽对象既是缺乏行动意志的主体，也是上帝已死之后的“折衷宗教”热潮企图恢复宗教对个人拯救的意图。

当代西方社会主体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并不是违反社会禁忌所带来的负罪感，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负罪感、焦虑等神经官能症状的普遍化对应了资本主义发展既定阶段各种禁忌达到一定程度形成对人内在欲望的抑制。西方社会经过战后各种解放运动的洗礼，个体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包括性禁忌在内的诸多社会禁忌消失的自由。与这个阶段对应的不再是神经官能症，而是忧郁症，如果这个医学专用名词可以借代表述某种普遍的社会氛围。个体被命令承担自己的命运，做出自己的选择，或者说叫“消费自己的自由”，竞争意识和对个人能力的量化标准使个体感到此前可能没有的压力。吉勒·力波维兹基的说法并无二异：表面的个人主义浪潮掩盖不了缺乏坚实个人性的脆弱的主体。今日西方社会处于个人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即自恋的阶段，主体表现出对自身之外的事物的漠不关心、公共

领域的缩减、私人空间和主体内在性的扩张，这一切都造成了主体行动的困境。焦躁和自闭成为当代主体的两个极端。艾什诺兹和图森通过各自的文学作品，试图用虚构的方式呈现一个昭然的社会现实，即主体行动能力的萎缩。艾什诺兹笔下焦躁的主体在行动中逃遁，迫切行动的冲动代替理性成为行动动机，行动主体无法在行动中展现自身内在性。与之相反的是图森的小说，他描绘了一个有意识却没有行动能力，在逃遁中行动的主体形象。一个对外行动，一个对内静止；一个缺乏内在性，一个内在性压倒一切；一个需要以不断行动来摆脱莫名的焦躁；一个需要摆脱行动来获得虚幻的安宁。艾什诺兹和图森描写了深受“责任病”苦恼的当代主体的两个极端表现，而这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或多或少在两个尺度间游离，试图找到平衡点。摆在他们面前的迫切问题是：我们还有行动的可能性吗？

注解【Notes】

参见 Jean Echenoz, *Un an*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97).

参见 Gilles Lopovetsky, *L'Ere du vide*, «folio» (Paris: Gallimard, 1983).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Bertho, Sophie. "Jean-Philippe Toussaint et la métaphysique." *Jeunes auteurs de Minuit*. Textes réunis par Michèle Ammouche-Kremers et Henk Hillenaar. Amsterdam: Atlanta, GA, Rodopi, 1994. 15-25.
- . "L'attente postmoderne, à propos de la littérature contemporaine en France." *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4-5 (1991): 735-43.
- Bessard-Banquy, Olivier. *Le roman ludique, Jean Echenoz, Jean-Philippe Toussaint, Eric Chevillard*. Villeneuve d'Ascq: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Septentrion, 2003.
- . "Monsieur Toussaint." *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543(1998): 106-13.
- Biron, Michel. "Evitons les conflits." *L'Atelier du roman* 36 (2003): 23-31.
- Echenoz, Jean. *Cherokee*.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83.
- . *Le Méridien de Greenwich*.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79.
- . *Un an*.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97.
- Ehrenberg, Alain. *La fatigue d'être soi, dépression et société*. Paris: Odile Jacob, 1998.
- Lipovetsky, Gilles. *L'Ere du vide*, «folio». Paris: Gallimard, 1983.
- Rosset, Clément. *Loin de moi, étude sur l'identité*.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99.
- Toussaint, Jean-Philippe. *Fuir*.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2005.
- . *La Salle de bain*.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85.
- . *Monsieur*.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86.
- Viart, Dominique, Bruno Vercier, and Franck Evrard.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au présent, héritage, modernité, mutations*. 2e édition augmentée. Paris: Bordas, 2008.

责任编辑：杜娟